

# 附：三笠宫采访录

王树才译 邹念之校

## “揣摸不透的中国人的心”

明年8月15日，我国将迎来战争结束50周年。战后，虽在焦土上建设起今天的繁荣，然而战争末期，日本在中国和南太平洋战场遭到敌人的反击，每天喘息于岌岌不可终日的毫无前途的战争之中。尽管如此，当时的日本却仍在“鬼畜美英”的叫骂声中空喊“胜利”。在这样异乎寻常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派遣军参谋前去中国赴任的三笠宫崇仁亲王殿下，面对着当地的实情，目睹了日本军中缺乏反省和谦虚的事实，写下了提醒日本军部对侵略主义进行反思的文书。这份文书历经半个世纪以后，在国立国会图书馆的资料堆中被发掘出来。经过本刊对史实的确认工作以后，三笠宫殿下始得与这份历史文书重逢。为了迎接战后50周年，本刊特将本期编成《特集》，其中心内容是：殿下亲笔写下《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这份历史文书的写作动机以及殿下本人上溯50年前的回忆。同时，将下列资料和文章一并收录：(1)这一历史文书的全文；(2)作为文书附录的《棉铁集》——和中国人交往时应有的心理沟通；(3)发现这一文书的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须崎慎一教授的解说；(4)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伊藤隆的评述；(5)据说在战争期间曾见过这一文书的剧作家兼演员森繁久弥氏的回忆等。

在东京原赤坂私邸接受本刊编辑部采访的三笠宫殿下，今年已78岁，看起来还较年轻、健康，在长达一个半小时里，热心地谈了当时的情况和现时的心境。在谈到撰写这份文书的动机和当时的心情时，殿下说：“我实际看到和听到日本军队的种种残暴行为，深感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必须尽早结束战争。这一文书正是在这种欲罢不能的心情下撰写出来的”；“惟其如此，才被当时的中国派遣军视为‘危险文书’而遭到没收销毁的处分”；“然而那是遵循着昭和天皇的旨意写出的，如果不是皇族是不可能说出那些话的。”关于有争议的南京事件等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殿下一边举出具体事例一边断定地说：“用极端残酷的手段杀害俘虏，就是屠杀，与人数的多寡并无关系。”又说：“当

时日本由于退出了国际联盟,因而产生了连国际法都可以不遵守的这样一种错误的思潮。”

三笠宫殿下战后成为东京大学的研究生,走上了历史学者的道路。曾以反对纪元节<sup>①</sup>和“电车通勤”<sup>②</sup>等问题而在社会上引为话题。但是,就太平洋战争等问题做出如此集中而概括的发言,迄今还是未见前例的。在这次被发现的文书和采访中,显现了三笠宫殿下的直率、坦诚的学者品质。作为了解那个时代的当事者、昭和天皇的胞弟,三笠宫殿下的这一证词,是今后重新研究日中战争史的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料。

## 无论如何必须结束战争

### (访谈记录)

采访人:中野邦观(《读卖新闻》调查研究本部主任研究员)

三笠宫殿下恰恰于 50 年前的日中战争时,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撰写了题名为《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批判日中战争的文书(署名若杉参谋)。关于这份历经半个世纪才被发现的文书,《THIS IS 读卖》杂志编辑部请求三笠宫殿下:(1)确认是否他本人亲笔所写;(2)是否允许在杂志上刊载;(3)对当时情况加以说明。这得到了殿下的应允。

事先我们把这份文书及有关的解说文章寄送殿下过目。5 月 12 日,去港区原赤坂的殿下寓所拜访,谈话约一个半小时。由于再度看到当时已被军部当局定为“危险文书”而被宣告没收、烧毁处分的文书,殿下显得感慨殊深,兴味很浓,当即坦率、热情地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和昭和天皇的心情以及殿下本人对战争的回想等等。

在采访中,殿下着重谈到,日中两国相处,必须超越彼此间风俗、习惯的不同,力求友好和睦;甲午、日俄两次战争,实际上日本并没有战胜,日本人却错误地认为日本强大;昭和天皇深为与军部之间的不协调而苦恼,等等。这些言论,都是除亲历者之外不可能了解的宝贵的“证词”,尤其是“对那次悲惨的

① 战前日本以神武天皇即位之日即每年 2 月 11 日为纪元节,定为全国四大节日之一,是日举国休假庆祝。战后一度废除,但自 1966 年起又更名为“建国纪念日”而复活。(译者注)

② “电车通勤”,即每日上下班都乘电车(公共交通工具),不乘用私车或其它交通工具。(译者注)

战争深加反省,今后仍是必要的”一语,当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吧!

下面是访谈中的一问一答:

问:呈上的资料,殿下是否俱已过目?

答:哦,现在再看一遍,真是相当晦涩的文字啰。当时陆军所有的文件和命令等全是用这种旧文体书写的……

问:想请您确认一下,是否殿下亲笔所写?

答:这份文书确实是我写的。附录《棉铁集》也是我写的。由于到中国赴任之前,曾在大本营陆军部(平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负责情报工作)受过短期有关中国问题的特别集训;在中国执勤期间,又从各方面听到许多有益的见解,自己也开始了多方面的思索。

当时我就在想,总该找个办法结束战争,这是一种欲罢不能的心情。此后我一直希望能有机会重读一次,再加思考。此次多亏须崎慎一教授,在事隔50年后,使我得以重见当年的旧作,真是感慨万千。

问:《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这一标题也是殿下自己加的吗?

答:是的。

问:可否请谈一下形成这份文书的经过和原委?

答:我在南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当参谋整整一年(昭和十八年一月,1943,大尉——昭和十九年一月,1944,少佐)。在任期行将结束的时候,有人向我提议:可否对总司令部内的干部们讲话兼示告别之意。于是,我事先向青年军官们提出问题,要求他们回答。讲话时,我再用回答问题的形式陈述了我自己的见解。当时,总司令部内的年轻军官全部参加了听讲。将讲话原稿稍加以整理之后就形成了这份文书。

我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时(1934年,昭和九年),让政信大尉正在学校担任中队长,我到南京任职时他又恰好在南京总司令部任参谋(当时大佐)。那时关于中国问题曾听到他的许多谈论,所以这份讲话的原稿我事先曾请他看过,他是否又把原稿转呈俊六总司令官看过,我就记忆不清了。

问:须崎教授的解说中有这样的意思:这份文书如果未经中国派遣军首脑层的谅解,有些内容是不可能写出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答:现在谈起来也许会令人产生那种印象。但是,这份文书据说是“我离任后被总司令部定为‘危险文书’而被加以没收、销毁处分的。从这件事看来,当时全体派遣军还不具备能够予以‘谅解’的那种气氛,这一点则是确实的。

作为我本人来讲,也正因为具有所谓皇族的身份,才敢于这样大胆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自那以后过了几年,在一次有关电影的聚会上我和森繁久弥先生见了面,他对我说:“战争时期我在满洲曾见过殿下写的文书。”那时我以为那份文稿早已被完全销毁了,听到他的话不禁使我吃了一惊。

问:关于这份文书如何夹入阿部信行有关文件中,对于这份文书以后的遭遇等等,殿下是否曾有臆想和推测?还有,这份文书殿下本人是否曾有存留?

答:据说森繁久弥先生曾在满洲从事过广播工作,同时,曾任关东军参谋的河本大作在满洲时也曾与传播媒介有过关系。因此,这份文书很可能是通过情报系统的途径传到那里去的。

这份文书我手头应有存留,我住过的原赤坂的住宅在战争即将结束的5月25日大空袭中全部烧毁了,但在房后防空洞里的文件等等却未被烧毁而幸存下来。但在战败时由于听说美军要进驻,就用了一天时间把所有有关军事的文件全部烧毁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惜。

问:由于撰写了这份文书,对于其后殿下在陆军大本营任参谋和在装甲兵本部任职是否受到什么影响?

答:没有特别察觉到这份文书的影响。不过,在大本营当参谋时期曾有过反对“特攻”<sup>①</sup>的言论等等,当然要被看作危险分子了!

问:殿下回到东京以后,是在什么时候,经过什么途径,又是从谁那里听说这份文书已被中国派遣军销毁这件事的?

答:具体的时间和人完全没有记忆了。

问:能谈谈撰写《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的背景吗?

答:在中国任职一年间,日本军队占领的主要地方,我几乎都去视察过,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见闻。结果,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在民族心理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竟然如此大不相同。由于日本军队的残暴行为,激起中国人抗日、反日,这是任何人都能够理解的,然而由于民族性的差异,往往闹成日本人自以为出于善意为中国办的好事,反而使中国人

---

① “特攻”,全称为“特别攻击队”,即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用小型快速的飞机满载炸弹,由1—2人驾驶,直撞敌舰或敌机而与之同归于尽的一种残酷的自杀战术。  
(译者注)

感到厌烦至极，不堪忍受，这确实令人遗憾。

譬如驱赶牛、马等牲畜走路的时候，日本人总是在前面拉着缰绳牵着走，中国人不拴缰绳，而是从后面赶着牲畜，让它自己走。还有，用鱼鹰捕鱼也是一样：在日本，渔夫把细麻绳拴在鱼鹰脖子上，用以操纵多数的鱼鹰，其技术之娴熟确是惊人；但在中国，则是不拴细绳，让鱼鹰自己去捕鱼。对待人，也是这样。

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所谓中国人和日本人是同文同种这一错觉。我们在学校上汉文课时，曾学过用折返符号<sup>①</sup> 阅读汉文的方法。汉语的语法和日语的语法不同，毋宁说与英语相近似。因此，用头脑思考事物的时候，日中两方的顺序也就互不一致。即是说，话题重点的放置位置各不相同。

此外，使用相同的汉字表现的词语，在两国间其意思有不少是截然不同的。譬如：日本语的“汽车”一词，在中国叫“火车”，中国语的“汽车”，在日本叫“自動車”，日本语的“自転車”，在中国则是“自行车”了。

我曾听到过这样一个笑话：日本兵占领了中国的农村，看见村里有鸡，就用笔写出一个“卵”字向村民讨要，中国人一看大惊失色，慌忙逃散。后来的结果虽然未得详知，但可想象那时日本兵必定勃然大怒，弄得不好，那个中国农民很可能被日本兵杀害了。原来汉文的“卵”字，虽有鸟卵之意，但也有男人的要害即“睾丸”的意思。如果说日本军队来了，向男人索取他的要害即睾丸，那位农民大惊而逃，那是理所当然的。对日本人来说，如果想要鸡的“卵”，必须写作“鸡蛋”。因为由这样一些极平常的琐碎问题而引起双方反目的事例太多，所以我又写了《棉铁集》。

问：从《文书》的内容看，有些地方透露出昭和天皇的意向，使人想象这份文书是殿下与昭和天皇取得充分联系之后写出的。实情究竟如何？

答：在我的文章或其他言论中，有时确实透露出昭和天皇对和平的强烈愿望，也有时对军部违反昭和天皇旨意的独断专行含蓄地提出过批判。我曾直接或间接地与昭和天皇见面或聆听教诲，自以为已理解了天皇的心情。

至于“是否与天皇取得密切联系之后写出的文章”，对这一提问，我可以明确地回答：“不是”。但既自以为大体上了解昭和天皇的心情，因而也可以说文书是遵循着天皇的感情脉络写出的。

---

① 日本人阅读古汉文或汉诗时，为使其能按照日文的语法诵读又不失其原意而创造出的一种规定词语位置和诵读顺序的符号（译者注）。

使我深为遗憾的是，一次也没有与天皇见过面的军官们，动辄就说：“这是天皇的心愿。”然而稍一追究，结果倒是他们个人的“心愿”。在战争结束前夕的御前会议上，身为大元帅的昭和天皇曾有大意如下的发言：“来自陆军的报告究竟有多少可以相信？我对此颇有怀疑！”双方的想法可能总是有分歧吧？想起来实在是遗憾。

由此出发，对华新方针<sup>①</sup>就是要清算过去日本军队失败的原因，而使之成为正义之师，同时诚心诚意地实施对中国人有益的政策。恰值这个对华新方针经日本政府宣布后不久，我就到中国赴任，这实在是天助神佑。昭和天皇也非常欣赏这一方针，并热切期望其实施。因此，我到任以后，就把它当作一面“正义的旗帜”<sup>②</sup>，每当奉命出差到日本军占领的中国各地时，无不努力加以宣示，以求贯彻。

问：除辻政信大佐以外，相信在中国派遣军内部还有和殿下持相同见解的人，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长期研究中国，持有切合实际的见解的人有很多，遗憾的是他们的意见在实践中没有被反映出来。

问：东京大学伊藤隆名誉教授指出：在殿下的心境中，似有为实现日中和平而撰写这份文书之意，真相究竟如何？

答：如同伊藤隆教授所说的那样，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日中和平。特别是辻政信参谋对此尤为热诚，他曾进行过与蒋介石直接交涉的工作。

在长江南岸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曾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断然举行了对蒋介石亡母的“慰灵祭”<sup>③</sup>，就是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实现的。

辻参谋很早就热衷于与重庆政府实现和平，他同对方的秘密商谈，已达

---

① 对华新方针，系指1943年1月9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签署的《日华共同宣言》和关于归还租界及废除治外法权等的《日华协定》（译者注）。

② 原文为“锦之御旗”，用赤锦刺绣制成。镰仓时代以后朝廷征讨叛军时用作官军的标志，以象征正义。

③ 蒋介石亡母慰灵祭：据长冈弥一郎所著《军人·辻政信》一书载称：“某日，三笠宫殿下拿着蒋介石故乡风景照片来找辻参谋，并透露心情说：‘我总想对蒋氏亡母祭奠一番，哪怕仅到墓前祭扫一次也好。’辻参谋立即感到，这莫非是天意，是圣旨？于是，就在蒋氏亡母的忌辰即1943年11月25日那一天，举行了战争开始以来首次‘日、华军官民战殁者联合慰灵祭’。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时，当即中断了正在召开的重大会议，步入内室，呜咽之声达于户外。”（此注为原文注释）。

到由他本人亲自潜往重庆直接商谈的地步。为此,他曾返回东京请示报告,当时他的心情如何激昂,是可以想见的!

据闻,这一计划曾得到东条首相的默许,也曾密奏于天皇,但遭到当时南京政府(汪精卫主席)的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将的反对而夭折。如果站在南京政府的立场,不仅柴山,即使换成另一个人,恐怕亦不得不那么表态;然而身为一国的首相,竟为一介顾问的意见所左右,这就不免大成问题了。固然,作为负有保护和扶植南京政府之责的日本政府首脑,东条的处境也许是无可奈何的。然而今天回顾起来,东条这个人,在处理事务方面虽有出色的才干但在政治方面如能再有些策略……不禁令人为之扼腕。

问:对于与中国的和平工作,昭和天皇的意向如何?有人认为殿下的活动,是在昭和天皇的意志导引下开展的。实情是否如此?

答:昭和天皇一向是严格遵守命令系统<sup>①</sup>的。对于直接命令系统以外的我,即使是亲兄弟,也从来和绝对未曾给予过任何指示。

问:那么,连殿下去中国这件事,也不是昭和天皇的希望吗?

答:我从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研究部研究战史,不久就到了调动工作的时候,我即表明想到战地去工作的愿望。至于去中国,是陆军省人事局决定的。其后,陆军大臣可能曾向陛下奏报,但陛下说了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问:这份文书的内容是否曾向昭和天皇上奏,或者非正式地禀陈过?

答:没有特为此事向陛下奏报的记忆,但在偶尔面谒时也曾片断地陈述过中国的实情。

问:不管怎么说,昭和天皇既对实现和平抱有很强的愿望,而陆军和当地驻军却总不听话,致使战线不断扩大。这种状况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昭和天皇为此非常忧心吧?

答:这应从满洲问题说起。日俄战争以后,俄国把从中国租借的关东州(辽东半岛的南部——译者)让给了日本,日本为了加以守卫而设置了关东军。当时在满洲拥有军事实力的是张作霖。最初,日本方面也曾给张以援助,

---

① 日本命令系统(或曰程序,可分政令和军令二系)极为严格,例如同是内阁的各“省”(部)间的政务,不能彼此互用“令”来传达或联系,同属军令系统的陆军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之间亦是如此。即使完全属于同一系统内的各级单位之间,凡报告、请示和命令、指示等,都必须逐级上呈或下达,不得越级。此点,虽是各国的通例,但日本尤为严格。(译者注)

后来张氏的独立自主路线逐渐强硬，关东军的激进派参谋们便产生了危机感，于是策划了炸毁张氏所乘列车的事件。那是1928年的事，正是我进中学的那一年。从那以后，日本政府和陆军首脑部都未曾料到的下克上事件连续发生，终于发展到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在此期间，昭和天皇的苦恼，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质言之，满洲事变只不过是近因，远因应追溯到明治维新（1868年）。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陆军采用法兰西的陆军制度。稍后，由于法兰西在普法战争中（1870—1871年）为普鲁士所击败，于是日本陆军又转而按普鲁士（德意志）的军制改编了。德意志的战略着眼点是速战速决，即所谓决战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采用的都是这种战略，结果都失败了。

我在骑兵联队和陆军大学期间，每天所受的教育，都是在满洲对苏联军队进行决战战争。同美国或英国进行战争，我几乎连想也没有想过。在这种情况下，昭和十六年（1941）十二月八日爆发的战争，对手竟是美、英的军队。其后，虽仓惶地转变为对美、英战争的教育，但从明治以来的传统却不是一下子能够转变过来的。记得我们在上学期间，虽然也讲授过一些英国式的持久战略，但不怎么重视。这当然就不易取胜了。

问：日本接连不断地扩大战线，终于陷入不能自拔的窘境，实在令人遗憾。

答：陆军大学里有许多学科，最重要的是“战术”和“战史”两科。我入陆军前在习志野骑兵第十五联队执勤时，联队长曾更换过几个人，其中一位曾是陆大战术教官中的佼佼者。然而就是这位前陆大的优秀战术教官，在一次实际指挥部队演习之际，竟然完全陷于敌军的包围而战败。白面书生纸上谈兵的演习，一遇到意想不到的事态，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以致造成失误。那时我才深刻认识到，纸上谈兵的战术和实战绝不是一回事。

战史教官中，也有几位颇受欢迎且受尊敬的人。曾有过这样的故事：在源平之战中，平家的军队深夜在睡梦中为水鸟起飞时的击水声所惊醒，因而发生混乱遭致惨败。象这样的话题，在战术课中绝不会出现，只有在战史课中才能讲到。也就是说，只有通过战史，才能理解赤裸裸的人的本性。

〔稍略〕

在关于日俄战争的讲课中，听到日本陆军的攻击力绝对不强时，我不禁吃了一惊。日本人总是在说：日本军在日俄战争中胜利了，胜利了！但仔细研

究一下战史，即可知道日本军并未战胜。日本军之所以能够占领俄军阵地，常常是由于敌军退却。当时的俄军为了争取从欧洲经西伯利亚铁路而来的援军到达的时间，常常稍稍退却一步。最后俄军投降的原因并不是军事上失败，而是因为国内发生了政治动乱。但由此就造成一种敌弱我强、我军战胜的错觉。可怕的是，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昭和时代！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军队是有防御能力的，特别是在固守某一地点时，很能发挥特别顽强的力量。这可说是战国以来所谓与城池共存亡的传统精神所使然的吧！

顺便再说几句。甲午、日俄战争时期，军队的首脑人物都是经历过明治维新前后大变革的人们。与此相反，太平洋战争，则是持续长久的和平环境，那些精于纸上谈兵的人们得以发迹，占据了领导岗位。

政治家可说也是如此，我钦佩外国的政治家，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历史很有研究。我希望日本的政治家们也能好好地学学历史。

还有一种情况，是我在南京一年间所见到的，令我非常吃惊。这就是现地军队和参谋本部之间的歧异竟然如此之大。同是陆军，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气氛也完全不同。譬如，进入昭和二十年（1945年）以后，东京连遭美军B—29轰炸机的空袭，为了免遭空袭，东京方面考虑的是打击敌人飞机场。然而南京的日军却认为空袭东京的B—29只是在自己的头上飞过，南京日军不会遭受轰炸，因而不关痛痒。

东京方面根据自己头脑中的设想，虽曾要求现地军队攻击美国空军基地，但实际实行起来是极端困难的。例如重庆作战、桂林作战<sup>①</sup>等等，都曾实际考虑和实行过，但这必须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以少数的部队和装备长途跋涉，进行攻击，而且增援部队和辎重、器材等又不可能随时跟上。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方面抱怨说“东京方面在胡说什么”，也就无可厚非了。

问：最近，我国内阁阁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发言又惹起事端，为了同一问题反复惹出事端，不免令人困恼。不知殿下对此有何感受？

答：看到最近报刊等的记载，争论的焦点好象是人数问题。辞典中已有明

---

<sup>①</sup> 重庆作战计划，其目的在于迫蒋投降，后因太平洋战况不利而未能实施。桂林作战计划，其目的在于摧毁设立在桂林、成都等中国西南部的美国空军基地，于1944年5月27日开始发动，10月26日向成都机场发起攻击，11月4日攻占桂林第一机场。但美军又在塞班岛建成空军基地，对日空袭更加频繁。（译者注）

确的解释：所谓屠杀，就是用残忍的手段加以杀害，与人数的多寡并无关系。在战地，有这样一件事使我深为震惊：一个青年军官说：“为了对新兵进行训练，可用活生生的俘虏当靶子，叫新兵演练刺刀拼杀战术，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做，可以培养气魄。”我听到这些话时，内心受到强烈的震颤。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对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产生怀疑了！

还有，在南京总司令部时，曾看过在满洲的日本部队的实况纪录影片，其中有这样的画面：在广阔的原野中，被俘的中国人好象是被捆绑在木桩子上，日本军人对着他们又施放毒瓦斯，又发射毒气弹。其场景之凄惨，实在令人目不忍睹，当时我真想把自己的两眼捂盖起来。象这样的暴行，不叫屠杀又能叫什么呢？！

但是，日本军队从前并不是这样的。当时驻扎在北京的冈村宁次大将（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东京出身）等人，很早就对军规、军纪的败坏十分忧虑。他们曾经告诫部队：要严禁四恶（强奸、掠夺、放火、杀人）。我去北京时也直接听到过他说这些话。

甲午、日俄战争之际，据说连小队长<sup>①</sup>的衣袋里都经常装着一本国际法的小册子。战后，俄国俘虏被收容到日本内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有许多德国俘虏来到日本，他们都按照国际法受到保护，所以后来全都变成亲日的了。他们中间，有些人直到获释以后仍继续留在日本，以经营商店等为生。在神户，至今仍有生意很好的面包房老板或糕点师等住留着。

问：日本人究竟是否具有国际观念，此点姑置不论，但从本源来看，我们认为日本人总不该是一个嗜杀成性的好战的民族吧。那么为什么变成这样荒诞无稽了呢？

答：前面已经说过暗杀张作霖将军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又制造了所谓“满洲事变”。那本来是日本军自己策划的，但却对外发表欺骗宣传，胡说什么“残暴的中国士兵炸毁了铁路，袭击了我守备队”，等等。国内的日本人也许会相信，但外国人却是欺骗不了的。

当时国际联盟马上组成“日华纷争调查委员会”，派出了以李顿爵士为团长的调查团前来日本。我曾从当时在满洲任职的一位高级军医官口中听说：关东军曾经拿出带有霍乱菌的水果接待调查团一行，但以失败而告终。

问：让堂堂的国际机构的代表们吃霍乱菌等等，是一切正直的日本人都

---

① 日军的小队长，相当于我国的排长。（译者注）

无法想象的。象这样重大的犯罪行为,居然能毫无忌惮地干出来,我们同样作为日本人,不禁难以置信。

答:中国方面曾把日本军队的残暴行径制成电影,取名为《胜利进行曲》。那是日本方面在重庆附近缴获到的,后来转到我处。有一次我在回国联系工作时随身带到东京,也曾给昭和天皇看过。那时中国方面摄制的影片,当然宣传成份要大一些,但我认为其中许多部分确是日本军队实际干出的残暴行为!

当时,中国人把日本叫作东洋,所以就把日本人叫作“东洋鬼子”。

昭和天皇看后有何反应已记不清了,但我相信他内心一定是很惨痛的。

问:那么,坏事全是关东军干的吗?

答:关东军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一切历史事件都是有原因的,无因而起的事件是不存在的。那么,为什么产生了关东军,而且干出了那样一些事情?作为战史学,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深入研究。

稍微向上追溯一下:1929年发生了世界史上称为“大恐慌”的经济危机,出现了自美国开始然后波及欧洲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当时日本也出现了萧条,再加上欧美的危机迎头袭来,就在这个严重关头,发生了满洲事变。

1932年1月,又发生了上海事变,同年3月,关东军策划的“满洲国”脱胎而出了。5月,东京发生了“五·一五事件”,翌年3月,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形成与全世界为敌的局面。从此,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这种观念,便从日本军队的心目中逐渐消失了。接着,1936年“二·二六事件”发生,由此掀起了日本陆军内部的大动荡。

频频发生这类事件的原因何在呢?当然,历史事件是由多种原因复杂交错而引发起来的,如果仅凭一端而下定论,那是危险的。这里不能论及所有的问题,仅试举出一例而论,那就是1930年以后日本农村的萧条。那真是悲惨至极的。那时,军队每年都要征集兵员,其大部分是农民出身的青年;而与他们朝夕相聚、对他们承担教育责任的军官,也都是从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中通过考试选拔出来的学习和体格兼优的青年,他们当中,也以中产阶级以下的出身者居多。这些富于遐想的青年军官,看到与自己生死与共的年轻士兵们的家乡即农村的萧条、破落,不能无动于衷,而欲有所作为。这固然是当年的实情,但是,因此而以“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的形式发泄出来,实不免令人遗憾万千。

在那个年代里,对于日本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来说,当作希望的天地而

映入眼帘的首先就是近在咫尺的满洲，这也可以说是无可奈何的吧。然而，那是他国的领土，居住在那里的是他国的国民。如果是个人之间的问题，必然要构成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然而日本却在表面上千方百计地加以掩饰，硬说日本军干的是正当的事，这样一来，便一切问题都随之发生了。

制造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就是为了达到欺骗掩饰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想起那位成为日本军的阴谋牺牲品的满洲国皇帝、已故爱新觉罗·溥仪其人，实在感觉可怜而内心对他负咎。我和他也曾见过几面，那是一个善良的人，我衷心对他怀有悼念之情。

连侵入他人所有的土地都要构成非法侵占罪，更何况侵占他国的领土，这能说不是侵略吗？当时的日本政府，如果按照明治时代向南美移民那样的政策办理，事情也许会和平地取得进展。但因为满洲与日本的距离过近，且当时的日本人较普遍地存在着民族优越感和对中国人的蔑视观念，再加上前面所说的对在甲午、日俄两次战争中日本并未真正取得胜利，只是在政治上得胜而在军事上并未战胜这一点认识不足，因而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的结果。

以上所讲的这些问题，并未到此终结，现在依然继续存在，将来也很有可能再度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不是欧洲人，而是亚洲人。即使同是亚洲人，又是毗连的邻近国家，但两国的民族性和风俗习惯等都迥然不同。我们要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倾注最大的热情，为实现睦邻友好、和平共处而努力。

（译自《HTIS IS 读卖》1994年8月号）